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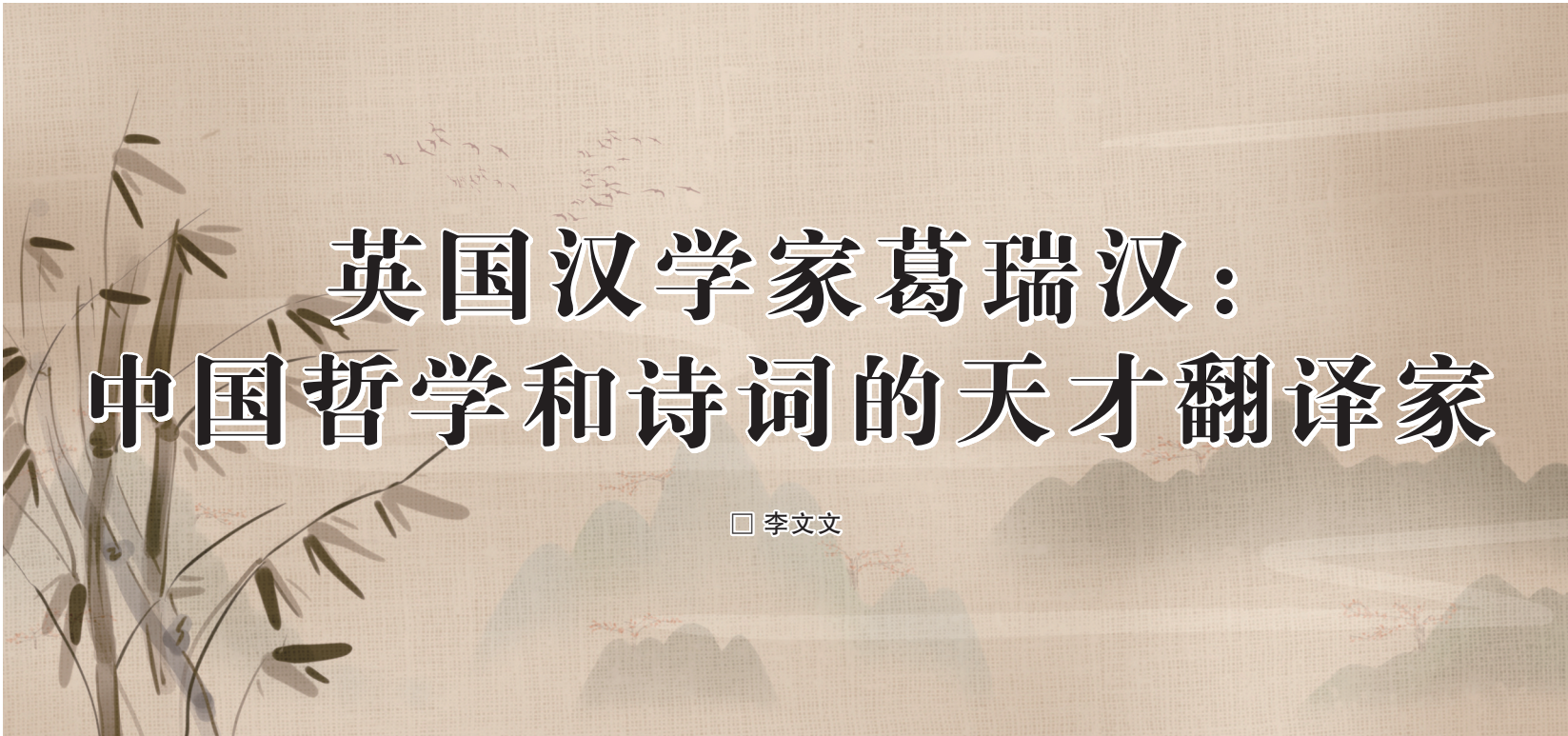
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年）是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英国《泰晤士报》称他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权威，中国哲学与诗词的天才翻译家，把中国古代的生活理念介绍给西方的杰出阐释者。”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说：“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发现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试图把他的思想诠释得更清楚。”

葛瑞汉，1919年出生于威尔士，年轻时就读于牛津大学，学习神学。二战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并被派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日语。退役后，他重返亚非学院学习中文，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当选为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尽管葛瑞汉久居伦敦，但他热心讲学，周游世界，治学授业的步伐遍及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夏威夷大学等，精深广博的学术蜚声四海。葛瑞汉治学范围宽广，研究《庄子》、翻译《列子》，倾心于后期墨家哲学，译注唐诗，可谓“焕乎其有文章”。其中，《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是葛瑞汉的处女作，在英美接连再版，被誉为研究中国思想必读的经典名著。《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一书凝结着葛瑞汉对中国先秦哲学的独到认知，是其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美国汉学家史华慈高度评价说，“此书将使他长期享有汉学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荣誉”。

（一）

语言本于人心，语言反映思维。葛瑞汉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认为万物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总体而言，中国人有着关联思维方式，它的形成与古代汉语语法特点关系密切。

理解汉语首在认识汉字。作为一名专业汉学家，葛瑞汉当然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识字”，他深入探求汉字的独特性。葛瑞汉提出：“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音节都有其自己的书写符号，根据词序和语法小品词的位置与功能来



□ 李文文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中国哲学和诗词的天才翻译家

进行组织。字体不是像通常所猜测的那样系表意符号；不同的单音节词，无论多么接近同义词，都有不同的书写笔画，且小品词像别的词一样有它们自己的笔画。”古代汉语字形丰富，而语音相对贫乏，于是，在一个字的字源与相似发音的字之间，它们的关系呈现于笔画的结构而非语音结构。要知道中华文明绵延不衰，汉字功莫大焉，是其延续与统一的重要工具。自古及今，中华大地上遍布着操着难懂方言的说话人，汉字却历经千载仍可读懂。

说到句法结构，总体而言，印欧语系的句子以名词为中心，主要动词必须是名词即其主语的谓语，由名词决定人称和数；在古汉语的动词句子中，主语是任意的成分，词形变化最小的是动词。基于这一发现，葛瑞汉论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维上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是名词中心式的，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动词中心式的。以亚里士多德的“事物”和中国哲学的“事件”为例，“事物”是相互隔绝的，“事件”则是处于具体的关系场景中。具体来说，印欧语系设置主语、数词、时态，呈现出区别，持续地表现在每个句子中。然而，古汉字并没有印欧语系中可数名词在语法上的数字，古汉语也没有其在语法上的时态。这些

缺失使得西方学人有着对古汉语特点的一般性归纳，如“脱离了语境，汉字没有语法功能”“事实上每段都是含混不清的”“在严格意义上，（古汉语）可能既没有内涵定义又没有外延定义”。对此，人们不得不困惑用汉语写一部历史叙述何以可能？事实上，综观全球，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一直处于发达领先地位。对于这些当时广为流传的看法，葛瑞汉将它们视作关于汉语的高度概括，然而却都始于完全过时的假设。

葛瑞汉明确提出，中国人的思维是如此讲逻辑，然而，若是对于中国人的思维、对于汉语自身的逻辑理解不足，则难免将其归于超越语言之外，甚至是非语言的行列。如果说印欧语言重在逻辑训练，那么，古代汉语则另作他用，它致力于相似与区别方面的敏感性教育，因为它所具备的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维。在关联思维的视域下，当问及事物的实际时，不是问它是什么，而是根据其名称问它指什么与它像什么，中国哲学关注的不仅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葛瑞汉的理解正确而且透辟，他将此看作古代汉语思维的指南。

（二）

在中国思想史上，如果找一位对

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人，不难想到孔子。人们将孔子比作月光，辉映着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开创了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瑞汉不仅是一位汉学家、哲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史家，他立足于孔子与西方哲学的历史，重点置身于20世纪，以开放的心态、对话的思维，综合阐述着两种不同传统的沟通与交融。20世纪，西方哲学家开始怀疑自身的概念体系，转而探讨古代或异域思想家的哲学，寻找新的选择。在抛弃自己的概念习惯方面，葛瑞汉认为可以从前苏格拉底与中国哲学中得到帮助。孔子对当代哲学的可能意义关联开始被专业哲学家意识到，葛瑞汉留意到最早有这种意识的专业哲学家芬格莱特，他的《孔子：即凡而圣》激发了西方哲学界对孔子的思考，开始把孔子视为道德哲学的指南。他尤其关注到孔子有着对社会礼仪运作的深邃洞识，这使得有“德”之人没有关于习俗的抽象知识，却能用轻易得到的技能与美德驾驭它们，虽然“无为”，但能强化周围的秩序。孔子的思维方式能够帮助西方哲学家回避分析哲学所不满意的二分法，诸如心与身、内与外等。葛

瑞汉引用哲学家郝大维和汉学家安乐哲的观点来对孔子与20世纪哲学进行总结，那便是将孔子树立为摆脱西方人对超验的长期依赖的后现代主义的楷模。在孔子看来，天人相互作用，人在回应中亦作用于“天”，影响“命”，复归于“道”。

在比较文化的视域中，葛瑞汉深刻认识到儒家的生命力，作为周传统的守护人，他们亦成为中华文明的捍卫者。没有谁能够将它夷为平地，重新创立崭新开端。儒学将它的所有一般观念根植于对已存的习俗、学问和历史先例的缜密研究之中，独自许诺将个体完全一体化于它的文化、社会和宇宙之中。在葛瑞汉看来，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之一。

（三）

在思想界，探求中华文明不衰的秘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比如，黑格尔提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毫无疑问，一个民族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延续下来，一定是有理由的。依葛瑞汉所见，大约在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时候，中国发现了文明不衰、社会组织不灭的秘密。他提出，如果思想观念根本上是对社会力量有影响的，那么，中国“轴心时

代”的哲学必然被认为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成功。因此，葛瑞汉试着从中国哲学的特点入手，以一个简要的处方写下中华文明不衰之秘诀。在他看来，这使得中国拥有了几乎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征服了变化无常的命运。

其中，儒家，一种批评性反应层面下的基于基本的社会契约、血缘关系和传统习俗的伦理，它以家庭为模型构造社会共同体，使君臣、父子以及古今、祖先与后代相关联。法家，一种具有治理规模空前与习俗多样的帝国之方法的理性统治术。阴阳家，一种以社会共同体为模型构造宇宙的原始科学。道家，将个体生命直接与宇宙关联的哲学。墨家，一种限于实用的理性。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同化了儒家的道德、法家的行政技能、阴阳学派的宇宙论、道家与特定时期的佛教思想。对于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在论道的交锋中，将对手视为失之片面的而非完全谬误。中国思想倾向于将A置于B之上而不是排除B；作为这种调和而非冲突的倾向，成为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的另一因素。

在对中国哲学进行意义阐释时，葛瑞汉始终蕴含着对西方人心灵危机的关怀。为了诊治西方思想的弊病，势必需要拓宽视野，其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正是致力于此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谈天道、论人道，在求道的路途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尺度。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西方文化有着对理性十足甚至过分的信奉，在手段层面结出硕果。然而，时至今日，西方传统似乎正在摒弃为目的寻求理性依据的长期诉求。那是因为学者们发现，当追求理性依据成为哲学的主题，甚至是唯一主题时，哲学家们沉迷于概念的游戏而远离了生活、智慧、爱，于是，也就背离了哲学的真正目的。葛瑞汉特别注意到，中华文明，长处总是在其平衡感，从一开始便能恰如其分地看待理性，这是中华文明不衰之秘诀的一部分。



从良弼： 打破『洋火』垄断的

火柴大王

□ 荆晓燕

从良弼（1868—1945年），号庭梦，山东蓬莱人，山东火柴工业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慈善家。他曾先后在济南、济宁、青岛等地设厂，创办振业火柴公司，经营规模居国内各火柴厂之冠。他善于市场经营、勇于技术革新，对于民族火柴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上海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并称为“南刘北从”。正是这些民族企业家的崛起，逐步打破了“洋火”的垄断，燃起“国火”之光。

实业救国，振兴民族工业

1868年，从良弼出生于山东蓬莱，自幼家境贫寒。青年时期，他以伙计的身份进入烟台“东顺泰”商行，跟随商船从事进出口贸易，往来中日间，出没风波里。从良弼头脑聪慧，又肯吃苦耐劳，不仅很快学会了做生意，还自学珠算和日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东顺泰”商行在日本大阪的总负责人，并在此当选为华商会会长，广泛团结众多旅日华侨，积极维护华商切身利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访日本，宣传“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主张，从良弼深受震动，决定回国创业。1913年，他在山东济南创办“振业火柴公司”，“振业”二字即来源于“振兴中华，实业救国”，公司的名称真切反映出他创业的初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日货遭到抵制，国货开始流行，振业火柴供不应求，这为从良弼的事业发展提供了良机。他于次年在济宁设立分厂，扩大生产规模。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从良弼开始考虑在青岛布局火柴产业。经过德占时期和日占时期，曾经的殖民者在青岛创办了大量工厂，在重重围困下，民族工业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民族企业家奋力拼搏，为民族工业杀出一条血路。周学熙家族在青岛创建华新

纱厂，与9家日本纱厂抗衡；尹致中创办中国的大型现代制针厂，让青岛成为抵制洋针的策源地和大本营。而从良弼也立志在青岛创办火柴厂，力图与日资火柴厂进行竞争，从而点燃“国火”，结束“洋火”垄断市场的局面。

1924年，从良弼赴青岛考察，开始投资建厂，1928年正式投产。由于要跟日资火柴厂竞争，青岛分厂在投资规模、生产设备、技术力量、品质管理方面都位居3家振业火柴厂之首。当时在中国的日本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几乎都采用冷胶药头，但振业火柴进行技术革新，采用热胶，这种工艺虽然成本较高，但性能更优，火柴头具有表面光滑、不易受潮、发火有力的特点，因而广受欢迎，市场份额逐步增加，“三光”“吉星”“山狮”“津昌蜘蛛”等火柴品牌风靡一时。1933年，3家火柴厂正式改组为“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也随之从济南迁至青岛。从良弼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他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外资不得入股，体现了一个民族企业家自立自强的决心。在从良弼的带动下，青岛的民族火柴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到1937年，民族火柴厂达到10家，而日资火柴厂缩至4家，青岛火柴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成为全国“国火”生产基地。从良弼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东火柴大王”，而且在全国火柴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乐善好施，投身慈善事业

从良弼为人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常为各地赈灾捐款，曾先后3次获得国家、省级褒奖。他尤其重视教育，1924年，在蓬莱建立良弼小学，办学规模居全县之首。良弼小学不仅教授常规的学科知识，还非常重视珠算等技能方面的教育，很多毕业生都进入振业火柴公司工作。振业火柴公

司的最后一位厂长蔡吉庭就是从良弼小学的毕业生，他在晚年曾对从良弼的孙子从兆桓谈起这段往事，“我是穷孩子，最穷，交不起学费，你爷爷就不收我的学费，我给你爷爷的回报，就是我从入校到毕业，永远是全校第一名，没有别人拿过”。

从良弼定居青岛之后，将更多的精力、财力转移到慈善事业上。1927年，他开始担任青岛红万字会的会长，开展赈灾、办学、救助、救治等方面的慈善活动。青岛红万字会的旧址规模有限，难以满足各项慈善活动的需要。从良弼便与好友贺俊生、邹道臣等共同募募捐款，筹建新址，历时7年，终于建成规模宏大的红万字会大楼，在此开设救济医院、慈济小学、保育院以及职业学校等。这座建筑物造型独特，兼有中国宫殿式、罗马柱廊式、阿拉伯式三种不同风格，200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青岛市美术馆。从良弼为慈善事业投入巨资，但他自身的生活却比较简朴。从良弼之孙从肇棠诞生于1937年，年幼时曾与祖父共同生活过9年，据他回忆，家里原来有6个大缸，腌的全是咸菜，有一段时期，“十八口之家，一天就一块现大洋的生活费，由奶奶掌管。吃饭也很有规矩，爷爷奶奶先吃，叔叔大爷其次，之后才是媳妇带着孩子吃，到我们只剩菜汤了，不够就吃咸菜”。

不畏淫威，坚守民族气节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月10日，日寇第二次占领青岛，青岛人民再次陷入深渊。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实行“以华制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在商界极有威望又通晓日语的从良弼进入日军的视野，他们软硬兼施，逼迫从良弼担任青岛商会会长。事关民族气节，从良弼没有丝毫犹



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火柴工业

豫，以自己年老体弱、不通政事为理由断然拒绝。日方不死心，不断施压，但从良弼决心已定、不为所动，显示出“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和气节。

从良弼不仅坚守自身的气节，而且勇敢同日方周旋，营救同胞。1942年冬天，日军在胶东地区进行拉网式“扫荡”，抓捕上千名民众，关押在青岛汇泉体育场。为找出其中的抗日游击队员，日军对他们严刑拷打。时值寒冬，饥寒交迫之下再遭遇非人折磨，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从良弼得知这种情况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积极营救。最后，由从良弼进行担保，并花费高价赎金，将幸存的600余人解救出来，临时安置在红万字会鱼山路会馆内。红万字会筹集资金数万元，为他们医治伤病、提供衣食、发放路费。据从兆桓回忆，为了让这些民众早日免于饥寒，从良弼甚至发动家人为他们赶做棉衣棉裤。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人们称从良弼为“中国的辛德勒”，赞誉他在日寇魔爪下营救同胞的勇气。

1945年12月，从良弼逝世。青岛《平民报》发布讣告，并评价道：“从氏籍隶蓬莱，壮年从事实业，创办振业火柴公司于济南、青岛、济宁三地，为我国火柴业之先进，晚年息居本市，致力于慈善事业，任世界红万字会青岛分会首席会长达二十年，自华北沦陷后，各处俘虏难民，得其拯救资助还乡者不下千人。”在从良弼的葬礼上，数千人为他送行，既有王正廷、刘鸿生这样的政商要人，也有红万字会附设的小学、商科职业学校的学生，甚至还有百余名乞丐，足见其声誉之大、威望之高。作为爱国实业家，他振兴民族火柴工业，壮大“国火”之光；作为著名慈善家，他乐善好施，兴办学校、医院，彰显真情之暖。在国家蒙难之际，他不畏淫威，拒绝与日寇合作，积极营救同胞，展现出不屈的风骨与民族气节。

近现代
实业家
小传